

梁 启 超



中国历史小丛书

梁 啟 超

LIANG QI CHAO

中華書局出版

中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吴 晗

编 委：尹 达 白寿彝 刘祚五 任德惠
吴廷璠 何兹全 何家槐 何干之
汪 藻 周一良 邱汉生 金灿然
邵昂正 季羡林 陈乐素 陈哲文
侯仁之 郑天挺 胡朝芝 马少波
钱穆健 顾颉刚 潘智兹 戴 逸
(以姓氏笔划为序)

助 编：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室

梁 启 超

编 写 者 牛仰山
责任编辑 邵昂正
插 图 马寅初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暨国内外各埠均有分馆)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1号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 毫米 1/32·7/8 印张·12,000字

印数：00,001—80,500

1962年8月第1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8·354

定价：0.10元

中国历史小丛书

梁 启 超

牛 仰 山 編 写

目 录

一、康有为的得力助手.....	3
二、宣传改良主义思想.....	7
三、参与湖南維新运动.....	14
四、在百日維新前后.....	16
五、变法失败后走向反动.....	19
六、政治上最后的堕落.....	24

一、康有为的得力助手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做过两件大事，一件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另一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是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我們現在所要介紹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是领导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是一个进步的知識分子，在历史上起过好的作用；但是他后来沒有能跟着时代前进，所以又成为一个与革命为敌的反动人物。



梁启超象

了解这个历史人物的一生，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熟悉我国近代历史，而且也可以使我们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县人，字卓如，后来取号任公，1873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他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擅长写文章的才能，十二岁便中了秀才〔注一〕，十五岁便中了举人〔注二〕。他在十八岁以前，和一般封建地主家庭的子弟一样，所学的还只是八股文和一套传统的旧学问。到了十八岁那年，他开始和当时的进步思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发生接触。从此以后，这种思想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主宰着他一生的行动。因此，要了解梁启超这个人物，就得先了解这种支配他的思想和行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改良主义思想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民族危机日渐严重的情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越来越加深，清朝专制政权的统治也越来越黑暗。新兴不久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制，得不到顺利的发展。因此，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就成为当时两个最迫切的问题。一些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注一〕明清时代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生员，就称为秀才。

〔注二〕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考试，称为乡试，取中者称为举人。

的知識分子，便提出了一種企圖按照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模型來改變中國的國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主張。他們要求清朝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希望中國有一個不要根本改變封建制度而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憲法，並讓資產階級參加政權。這一些人，就是當時的資產階級改良派；這一些人的主張，就是改良主義思想。這種改良主義思想一方面反映着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暴露了對封建勢力的依賴。改良派也並不想同外國侵略者堅決鬥爭，有的甚至想依靠一些強國來抵禦另一些國家的侵略。可是，儘管這樣，他們要求對封建專制制度作某些改革，以保障民族獨立，並且使工商業能夠自由發展，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梁啟超接觸改良主義思想，是1890年他在廣州學海堂求學的時候拜康有為為師開始的。這年春天，他到北京去參加會試落選，在歸途路過上海的時候，在書店里買到徐繼畲 [yú] 著的《瀛寰志略》[注]。他讀了這部書，才開始懂得一些當時世界各國的形勢。他在書店里還瀏覽了上海製造局翻譯的一些介紹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新書，他雖然無力購買，可是對於這些書里所講的新知識卻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年秋天，康有為也從北京回到廣州。兩年前

[注]《瀛寰志略》是一本論述世界地理的書，1850年刊印。

(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应試的时候，看到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外患日益严重，曾經上书給光緒皇帝，主张变法图强，結果被政府官員扣住沒有递上去。但是这件事却使康有为聞名全国，成为一个很有声望的政治活动家。康有为回到广州之后，梁启超便由学海堂同学陈千秋介紹，去向康有为請求指教。

梁启超因为少年得志，而且对于当时流行的訓詁〔注〕詞章那一套旧學問也自以为有些根底，因而頗为沾沾自喜，自負不凡。不料康有为却兜[dōu]头給他一盆冷水，用透彻的分析和尖銳的批評，指出他原来认为了不起的那一套旧學問全是一些陈腐无用的东西。这次談話从上午七、八点钟开始，一直談到晚上九、十点钟，給梁启超以极大的震动，正如他自己所說，有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他当晚回到学海堂思索了一夜，沒有入睡。第二天，他又去見康有为，表示决心抛弃过去所学的那些无用之学，拜康有为做老师，重新学起。从此以后，他就退出学海堂，跟着康有为研究中国几千年来学术源流和历代政治的沿革得失，以及有关西方資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知識。第二年，康有为在广州設立学舍，叫作万木草堂，从事讲学。梁启超便在万木草堂讀了三年书。他不仅成了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

〔注〕訓詁，就是用現在的話來解釋古代的字义。

同时还帮助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发挥维新变法运动理论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在康有为领导变法运动的过程中，梁启超始终是他的得力助手。

二、宣傳改良主义思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遭到惨败。第二年，清朝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馬关条约》。这次战争的失败和卖国条约的签订，彻底暴露了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向外国侵略者屈膝投降的面目，民族危机陷于空前严重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压迫的新浪潮。与此同时，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发动了一次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在这次运动中，特别是在宣传变法主张、同顽固的封建势力进行论战的过程中，梁启超不仅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而且是一个出色的战将，表现了卓越的宣传鼓动才能。

当1895年4月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在日本馬关签订卖国条约的时候，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正在北京应试。康有为首先派梁启超鼓动在京应试的广东籍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清朝政府，要求拒绝签订和约，

在京的其他各省举人也采取行动，紛紛响应。接着，康有为又在梁启超的奔走联络之下，联合了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清朝政府拒和、迁都、变法，提出了“下詔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一套救国纲领。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注〕。这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也是梁启超参与变法维新运动的开端。

这次“公车上书”虽然被清朝政府官员拒绝转送给光绪皇帝，没有得到具体结果，但是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很大，变法维新运动从此宣告开始。

改良派一方面向清朝皇帝上书请求变法，另一方面又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兴办学堂，来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所组织的第一个学会是强学会，出版的第一份报纸是《中外纪闻》，影响最大的报纸是上海《时务报》，最有名的学堂是长沙时务学堂。在这些学会、报纸和学堂的创办和展开宣传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梁启超都是主要人物。特别是梁启超在《时务报》所发表的许多文章，对于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打击封建势力，起了重大的作用。

〔注〕汉朝时代，政府用车辆接送各地到京城来参加考试的人；当时联名上书的都是进京应试的举人，所以称为“公车上书”。

强学会是1895年8月由康有为发起，并由光緒皇帝的亲信大臣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组织的，梁启超被推为书记员。强学会的主要任务，根据章程规定，是：译印图书，刊行报纸，开大书藏（图书馆），开博物院。强学会成立之后，又在上海设立了分会，并在北京创刊了《中外纪闻》（又名《中外公报》）。

《中外纪闻》是一种小册子形式的报纸，用木刻活字印刷，每天发行一册，内容只有论文一篇，经常由梁启超执笔。这个报纸起初每天只印一千份，随着《京报》（政府公报）附送给清朝政府的王公大臣，目的在于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来影响他们，争取他们的支持。一个多月后，销数增加到三千多份。后来这个报纸因为受到顽固派的注意，一般官绅士大夫都不敢公开阅读，甚至送报人也因为怕受到连累，即使给以很高的报酬，也不肯代送了。

改良派的这些活动，终于受到了当权的顽固派的打击。1896年1月，北京、上海的强学会都被封闭，《中外纪闻》也被迫停刊。梁启超随即应上海强学会会员黄遵宪、汪康年的邀请，到上海去担任他们利用强学会余款创办的《时务报》的主笔。这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每十天出版一册。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先后写了《变法通议》、《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古议院考》、《论



梁啟超先后為《時務報》寫了《變法通議》、《古議院考》等等重要政論。

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注]等等重要政論。他在这些一泻千里、震撼人心的文章中，系統地宣传了变法維新的理論，和封建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論战，在当时知識分子中間发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在《变法通議》这篇文章中，从“劣則变，变則通，通則久”以及“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这些基本思想出发，指出了中国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性。他举出了清朝改变以前朝代的法制和清朝也曾层次改变自己的法制等等具体事实，把頑固派所謂“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改”的謬論駁得体无完肤。他警告清朝政府說：“变亦变，不变亦变”，如果不主动地实行变法，必将遭到列强瓜分之禍，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他又指出：变法不是重彈洋务派“富国强兵”的濫調，根本关键在于“变动科举”（摧毁那种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科举考試制度）和“工艺专利”（为民族資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些条件）。

梁启超在《古議院考》、《論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这几篇文章中，發揮了“民权”的学說。他用进化的历史观点，論証了民主政治制度

[注]嬗[shàn]，交替之意；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論君主政治必然为民主政治所代替的道理。

是人类历史上新的产物，它将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得到实现。他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提出了人人有自主之权的主张，认为一个人如果为国家尽了义务，就应该享有应得的权利，统治阶级不得以“防弊”为借口而干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他还指出，国家政权并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他根据这个论点，批判了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的君主政体，痛斥历代压制民权的专制帝王都是“民贼”。他认为“民权”的兴衰，是一个国家存亡的关键，只有兴民权，定立宪，开议院，才能“合千百万人为一身为一心，国始能强”。

梁启超虽然提出了“民权”主张，但是他认为只有先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然后才能在中国实现民权政治。因此，他主张应该首先实行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企图从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来实现政治上的改革。他虽然提倡“民权”，但却害怕革命，甚至反对革命，把革命说成是最危险的“下策”。他提倡“民权”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为了防止革命。他认为只要专制皇帝赐给人民一些政治权利，人民就不会起来革命。所以，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和其他改良主义者的政治思想一样，一方面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表现了他们对于广大人民取得政治权利的恐惧心理。

梁启超所鼓吹的民权思想，虽然含有抵制革命的

反动意义，但是他的锋芒主要是打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且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也起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梁启超的这种政治思想是进步的。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不仅議論新穎，很有說服力，而且文字也十分明快流暢，通俗易懂，所以很受一般知識分子的欢迎。因此，《时务报》从创刊以后，几个月之內，就銷售到一万多份。当时这是中国有報紙以来从所未有的現象。

梁启超在主編《时务报》的同时，还編了一套《西政丛书》。这是一部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經濟理論的重要书籍。他又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等集股创办了大同譯书局，出版了不少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书籍。康有为的一部闡述变法理論的重要著作《孔子改制考》，也是这个书局出版的。此外，梁启超还和其他一些改良派人士作了一些社会工作，如成立不纏足会，创办女学堂，等等。这些活动，使梁启超在广大知識分子中間享有很高的声誉。人們說起康有为，总要連帶提到梁启超，把他們合称为“康、梁”。

由于梁启超在上海主編《时务报》，并且进行了一些改良主义的社会活动，上海就成为当时改良派活动的中心地区。

改良派在上海积极开展活动，企图之一是获得英、美帝国主义和洋务派大官江督〔注一〕张之洞的支持。张之洞最初本是想利用改良派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后来看到《时务报》的言論触犯到封建統治阶级的利益，就时常加以干涉。他对于梁启超所提倡的民权学說，更不能容忍。《时务报》的經理汪康年原是张之洞的幕僚〔注二〕，和张之洞关系很密切。他秉承张之洞的意旨，对梁启超加以压抑。梁启超感到自己这个主笔好象是被資本家雇来的仆役一样，不能忍受。因此，1897年冬天，他就脱离《时务报》，到长沙去协助在湖南的改良派推行維新运动。

三、参与湖南維新运动

当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掀起变法維新运动的时候，改良派另一个重要人物譚嗣同也在湖南点燃了維新运动的火炬。当时湖南的巡撫陈宝箴〔zhēn〕、

〔注一〕两江指江苏、江西、安徽三省，两江总督就是上述三省的最高长官，总攬三省的軍政大权。

〔注二〕清代地方軍政官僚都聘請一些知識分子帮助出謀划策和办理日常公文事务，这些人員称为幕僚。